

第一编 概述

第一章 农业生产演变

第一节 地理概貌

天津市位于渤海之滨，东临渤海，北倚燕山，海河流域下游，境内河流纵横 洼淀广布 有“九河下梢”之称。滨海大片冲积平原 资源丰富 为水路咽喉 首都门户。地理位置于北纬 $38^{\circ}33'00''$ 至 $40^{\circ}15'02''$ 、东经 $118^{\circ}03'35''$ 至 $116^{\circ}42'05''$ 之间。境内南北长 188.8 公里 东西宽 117.3 公里。北、西、南三面分别与河北省、北京市为邻。气候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型气候。年平均气温 $11\sim 12^{\circ}\text{C}$ 。农作物可一年二熟，二年三熟。全市辖 12 个郊区、县，209 个乡，14 个镇。境内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 最高处为蓟县八仙桌子山峰 高达 1078 米。最低处大沽海口，为海拔零点。

我市地貌可划为山地、丘陵、平原、海岸带和洼地。山地面积为 651 平方公里，平原为 10664 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 94.25% 而在平原沉积中大面积是潮土、水稻土和滨海地区受海浸影响而发育成的海滨盐土。

我市水域广阔，河道纵横。流经全市的一级河道 19 条，全长 1095 公里 二级河道 79 条，全长 1363 公里。另有大中型水库 13

座。小型水库 35 座 水域面积 3.8 万公顷 还有洼淀近百个 有的长年积水 有的季节积水 较著名的洼淀 15 个 占地 22.26 万公顷。虽洼相连接，但水资源匮乏，农业用水不足。

我市生物资源较为丰富，植物区系以华北成分为主，兼有中亚区系，西伯利亚区系和亚热带区系成分，有维管束植物千余种。其中名特优新产品有小站稻、红小豆、磨盘柿子、蔬菜中有天津大白菜、韭菜、洋葱、青萝卜 均出口享有盛名。

第二节 建国前农业生产简况

天津市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期，远古先民已在北部山区广袤土地上采集 渔猎繁衍生息。公元前 4000 多年在蓟县围坊、别山一带出土的实物证明，原始的种植业已开始。在战国时期一些高地与滨海土地上也有农业生产的文物出土。古籍《周礼》职方记载 幽州宜黍、稷、稻。在我市南郊太平村出土的战国墓藏陶器中 有一具陶磨。该磨中发现有稻粒 稻叶痕迹 说明当时已有水稻种植。当时虽人口稀疏，但农业生产已有发展。西汉宣帝时（公元前 73~49 年）渤海太守龚遂提倡农业，使役耕牛与铁器，推动了种植业的发展与技术进步。东汉建武 15~22 年（公元 39~46 年）张堪任渔阳郡太守 泉州、雍奴为其所辖。为外御匈奴内兴农耕 取得“桑无附枝 麦秀两歧”的丰收 群众生活富裕乐不可支。

洪水及滨海风暴潮，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西汉初元 2 年（公元前 47 年）五月“渤海水大溢”，七月地震 海水浸没津、静、宁三个县及武清一部分，使泉州、东平舒两个距海近的县城被迫西迁。东汉永兴元年（公元 153 年）秋黄河水溢 流经津、沧、冀、

蓟州大饥。至永康元年（公元 167 年）渤海又溢，溺死者无数，洪水危害使滨海较低地区的农业生产停滞，多成为傍海煮盐之地。

东汉 中平四年（公元 187 年）黄巾起义，蓟州为主战场。此后三国时曹操为运粮所需，在我市修建平虏，泉州两渠及新河（宝坻向东通向滦河），使海河在历史上形成水系，运输发展带动农业，对我市水旱田种植起到促进作用。但政治上争夺与长期的战争、水旱灾害，都使农业粮食减收，人口减少。据《中国人口》记，东汉永和 5 年全市人口约有 110269 人，而到南北朝梁大同 9 年（公元 543 年）人口只剩 9984 人。

唐贞观之治到天宝七年（公元 742 年）我市为边远地区，当时人口增至 82485 人。唐代广置屯田，开元二十五年（公元 737 年）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静塞军在蓟州境内设二十屯共一千顷，即蓟州驻静塞军一万六千人，马五百匹。种植作物种类有粟、稻、小麦、大麦、胡麻、豌豆、荞麦等。随着唐代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后，客观上促进了当时蓟州、武清一带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此期间水旱灾害频繁发生，出现两次大饥荒，粮食匮乏。安史之乱（公元 755 年）以前，幽燕边防军队给养需由南方供应，稻米经运河或海运至幽州。唐武则天讨平契丹叛乱，命江淮租船自洛阳沿永济渠转运幽州，一次即达百余万斛。唐诗人杜甫于天宝年间从军北上途经幽燕作《后出塞》诗曰：“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其《昔游》诗云：“幽燕夙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持粟帛，泛海凌蓬莱。”刻画出唐代海运粮食的概况，当时军粮城（今天津东郊）已为人口聚居的海运港口。

五代十国以后，黄河流域相继出现割据政权混战。后梁时刘仁恭在海口（今芦台）屯兵，战事频繁，十室九空，农业凋蔽。公元

960年北宋建立王朝 重视农耕 招徕农户 垦植荒田 对农业进行大规模多渠道的改进 如引种“占城稻”推广踏犁、实行轮作等。宋初淳化时，曾派军队驻扎沿边屯垦种稻，即利用洼淀多水之优势，增产粮食，且在军事上又可以水田限制契丹骑兵由沿海突袭。由静海向西南 兴堰数百里 进行洼改种稻 获得丰收 并为开发改造我市盐碱地创出先例。

当时海河以北为辽地、契丹游牧部族入关后，与汉族兴农垦通商贾，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据辽通和 5年(公元 987年)在蓟州所建盘山祐唐寺讲堂碑中记有“...红稻香耕，实鱼盐之沃壤...”。至公元 1012年由于战事，我市人口又减至 30660人。农民颠沛流离，农业生产一蹶不振。

金灭辽、北宋后统一北方。公元 1153年海陵王迁都北京 我市蓟、武等地归中都路辖。经战后恢复，人口增加。金大定十二年(公元 1172年)及明昌四年(公元 1193年)在市内设宝坻、靖海两县治。随着当时战争南移，阶段性安定，至元光 2年(公元 1223年)全市已有 62845户。金章宗时设立粮仓重视农耕。明昌 3年(公元 1192年)议论及试行推广了西汉时的“区田法”划地为区，深掘施肥水密植，以夺高产。在城南委官监督推广区种之法。并命近侍巡视京畿禾稼，承安元年(公元 1196年)初行区种法。敕谕农民男劳力有地者人种一亩，人多者五亩止。后至泰和 4年(公元 1204年)讲议区田本欲利民 五方地肥瘠不同 农民见有利自当勉以效之。不然督责虽严亦徒劳耳”，随改敕随宜劝谕 亦竟不能行。金推广区田之法 前后九年 还开放禁地令民种植 兴修水利 诏颁布蝗防灾 但由于民族矛盾 缺乏投入 这些良多利益的农业政策与高产技术未能推开。

元朝建立后，组织军队在武清、宝坻等县，直至直沽海口酸

枣林（今西郊张窝小甸村）进行开荒屯垦。中统二年（公元 1261 年）为劝兴农桑，我市海河以北属涿州，以南属河间，辖分由忙古带与粘合从中二位劝农史巡察劝农，并明令山泽之禁，禁止各地戍兵、势家从事畜牧侵犯桑枣禾稼生产。中统三年河渠使郭守敬经直开引通州以南至杨村的河道，兴修水利以通漕运。当时京师之东、北、极、辽、海、南、滨、青、齐，皆是萑苇之地，随着漕运兴起，四乡人口逐渐增加，荒芜农田、苇地、猎场逐渐恢复耕作。当时全市已有 62083 人，较宋时增长一倍。据元代析津志记，谷、黍已有宜平川地种，抗风耐烈日，宜高山种的品种，谷壳薄厚之分，各种豆类较全。蔬菜已有采于山间和种于田园者，种类不多。果品林木也品种有限。元代由公元 1271~1368 年近百年中，气候较为温暖。因而百年中曾有较大的雨涝灾害达 32 次之多，旱灾有 13 次，发生饥馑有 5 次。同时元朝中，后期采取了民族分化与残酷压迫政策，元末农民大规模起义。由于江南漕运不畅，在至正 13 年（公元 1352 年）当时元丞相脱脱在京畿以东宝坻、宁河一带曾发展种植水稻，并设有稻田提举司。直至元朝灭亡后，尚有水利工程遗堤可见。

明朝建立后，永乐年间在津置卫筑城，修路设驿，治理河道，修建桥梁，发展漕运，设立粮仓。由山西等省大量移民，在市郊区新建村镇，人口增到 10 万多人。驻军屯种与农民种植使我市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由于种植业的扩展，在土地使用方面逐渐由近河的肥沃土地向洼地，荒野垦植。种植的作物也增加，如嘉靖年间，葛秫、高粱已传入种植，由于抗逆性强，逐渐成为大片洼地的主栽作物。再有花生、旱稻、棉花也相继传入推广。至明中叶以后，政治经济衰败，对农民增加税收与掠夺，一些农村鸡犬悉尽，丝粟皆空。据徐贞明《潞水容谈》记，当时蓟县黄崖关、马

伸桥、涸溜、白马庄、镇国庄等处尚未成农田。宝坻、宁河一带更是荒洼连片。明末万历 16 年(公元 1588 年)宝坻县令袁黄采取“轻刑缓征与民休息”政策,劝兴农桑,推广农艺,兴修水利,发展种稻。并著有劝农书,发给里老人手一册,书中详细介绍了农时、土肥、播管、开荒、提水工具等项专业实用技术,成为我市唯一的农业技术古籍专著,流传于后世。袁黄在任 5 年,劝兴农桑,推广水稻种植,四野田禾茂盛,积年荒地皆成美田。

但明末政治腐朽,经济趋于崩溃,对内加剧剥削,“皇庄”占夺民地遍及郡县,发生农民起义;外有日本侵朝战事,急需兵饷。万历 29 年(1601 年)海防巡抚汪应蛟在白坨口、葛沽一带,创建“十字围田”垦植种稻与豆薯共 333 公顷,获好收成。此后张慎言、董应举、左光斗等也在津推行屯种,以安置辽东难民,解决战争粮饷。大科学家徐光启由公元 1613~1621 年先后四次来津,研究农业种植,引入甘薯试种,此后并著农政全书。据《续文献通考》记,京津两市及河北大部、河南、山东小部,卫所屯田 67095 公顷。至嘉清中已发展到 291186 公顷。这些屯田推动了当时农业发展,但屯垦人员调离后,所垦屯田即逐渐荒废。

明代在蔬菜种植方面也有发展。除野生菜外,种植的蔬菜亦很多。特别在水域面积多的地方,水生蔬菜已有生产。

明代气候变化较大,发生水、旱、蝗灾害较多,造成大的饥荒灾年。据统计,明建卫 240 年中,共发生水灾近百次,严重的 22 年次,旱灾 130 年次,严重的有 10 年次。发生大蝗灾 12 年次。由于水旱蝗灾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出现人相食的惨痛局面。

清朝建立后,八旗子弟和官员强行圈占土地,掠夺民田、荒田。仅蓟县一县就占地 9122 顷,占该县总耕地面积的 85.6%,宝坻占地 6896 顷,占该县耕地 91.74%,武清县占地 4100 顷,

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在清朝 267 年间，由于气候的变化，水旱、蝗灾发生频繁 水灾有一百数十年次 严重 22 年次 其中有 9 次大水围城。旱灾有 195 年次 严重 13 年次，影响农业生产，造成粮食歉、绝收。但在此期间康熙 43 年(1704 年) 总兵蓝理保留与发展明代“ 围田 ”之法 招请福建老农在津传授种稻技艺 在城南海光寺一带开辟水田 1000 公顷 种稻获收 得到清廷赏识。“ 蓝田 ” 成为清代我市首次推广种稻成功经验记入史册。但蓝理调离天津后 仅三、四年‘ 蓝田 ’即又荒芜。

雍正执政以来，重视农业，曾令地方官吏不得阻挠勒索，农民自垦自报，水田六年起课，旱田十年起课。并以官爵诱使鼓励，促进农业发展。在津范围 首先恢复废弃之“ 蓝田 ”并在东、西泥沽、贺家口等处修复汪氏十围及蓟县、武清、宝坻等地开发种植水稻 共 800 余顷，乾隆年间总督方观承在直隶清河道任职及大城知县黄河润先后在津推广种植甘薯及窖藏薯种之法，为我市旱田区一年两熟，改进耕作制度，提高土地利用增产粮食创造了条件。

清朝中叶一些富豪兼并农民土地，所垦农田被废，农民逃亡，土地荒芜。王朝统治趋向衰落。鸦片战争后，又兴起垦植热潮。咸丰年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增格林沁督兵海口，先后在军粮城及直沽海口垦植种稻。清末列强入侵，为加强海防李鸿章调淮军周盛传，在小站一带垦植种稻，经 10 年开发 兴修水利 改变了围田依河自流灌溉的格局，垦区逐步向内地发展，使小站一带成为我市稻田发展的主要基地。至宣统 3 年军粮城开始用蒸汽机抽水灌田。

清末(1860 年) 我市开埠后，建立工厂人口增加，城市除去粮食以外，对蔬菜的需求，日益增长，市郊蔬菜种植业已兴起。

清末民初阶段，是我市农林业在行政管理，技术推广，扶持投入各方面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清末至民国我市成为直隶省会，列强租界林立，清廷与北洋政府对天津特别重视。清廷自设立农工商部后，直隶省设立农务总局，天津设劝业道，各县设劝业员。在组织农民方面 静海、宝坻两县先后成立县农会 这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农会。民国成立后 推行“实业救国”“棉铁政策”，天津也是重点地区。各县增设了劝业人员、农业讲习所，在市设立植物园、对棉、粮品种试验 造纸原料的研究 并进行良种交换推广。这一时期纺织工业发展，大量引种美棉，天津逐渐成为棉花的重要集散地。在开展农业教育方面，自清光绪时市内在如意庵创办农业中学，宝坻办起农桑学堂，小站设农业专科班，使农业教育由明代“屯学”逐渐向现代教育发展。但是农业教育均未能沿续多久，即告解散。

广大农村种植业受到轻纺发展影响，由民国十年后，各郊区出现植棉热潮。民国 9 年市郊棉田仅 56.4 公顷 而至 10 年即发展到 1238 公顷。此后各郊许多地方成为棉区。双口镇并设有试验场及植棉公会，劝导植棉工作。至民国 24 年各郊区已发展 55.7 万亩。中棉品种逐渐被美国长绒棉种取代。

为了开发种植业，社会上也兴起了一些团体协助发展农业。1922 年成立的“华洋义赈会”，在市郊区以兴办打井灌溉；兴办实验场，改良农产品品质扶助农村生产、推广技术为己任。1926 年在南郊正营兴办示范农场进行良种推广，改良机具，传授防治病虫害等技术，还组建农村信用社，参加农村经济活动。

清末也有一些商贾对农业垦植产生兴趣进行投资，在津成立福垦公司，投资 54 万两白银 于津、静、沧地区垦植荒地 2 万公顷，并进行畜牧饲养。

抗日战争对发展农业影响很大。我市一些早解放地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下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支援前线但因战事频繁环境不稳，农业生产艰难进行。1945年大生产运动后，群众情绪高涨，组织大插伙组进行生产。1946年土改及复查后群众生产热情很高，但发生了侵犯中农利益，战勤负担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曾出现宰杀牲畜、土地荒芜的严重后果，后经纠正到1948年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

“七·七”事变后我市农村沦陷。早在事变前，日本人即着手对我市及华北地区农业资源开发掠夺做了准备。事变以后，在被占领地区，首先逐渐非法侵占盗买农田，在津周围开设120多个农场，占地约占天津、宁河两县耕地之半，大面积改造盐碱地种植水稻，并成立华北垦业公司、精谷公司、米谷统制协会等机构，对我市广大农村进行掠夺与搜刮，供其战争需用。同时以天津为基地，在广大农村大量诱驱农村青壮劳动力招工拉夫出国、出关，走上背井离乡的死路。

沦陷时期日本人为了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也曾在津引入推广日、朝水稻蔬菜良种使用一些新的化肥、农药推广新的提水灌溉动力与机具，建设一批灌溉工程。1940年还在军粮城设立华北农事试验场军粮城支场，进行良种繁育与碱地改良等项科研工作，使一些新技术新农药、新品种在我市得以应用。由于沦陷时期农业受到压榨与伤害，粮食产量缺乏全面调查数字。全市植棉面积减少76.5%，产量减少63%，农村凋蔽，生产不振。

我市蓟北山林，东接陵区，西连兴隆。明代本为边关要塞民间田野至清划为陵区禁地山林茂盛。据《蓟县志》记载相传昔时遍山林木满川花果木材不胜其用。自清退位，一些官、商勾

结盗伐 经十数年破坏 森林所存无几 后又逢军阀混战 林地被伐无遗。民国 18 年河北省始建立省林垦局接管，并着手恢复，未几抗日战争爆发，山区为敌我争夺焦点，日军推行‘三光政策’大量伐、焚林木 成为童山。惟盘山一带林木得以保存 解放后 始逐渐恢复为次生山林。

我市蔬菜种植历史虽久，但面积扩展较慢，随着城市发展及人口的增长，蔬菜种植面积和品种也不断增加。早期缺乏统计调查，至民国 20 年市郊已有商品菜田 2271 公顷，五个县有菜田 1800 公顷，多为自食。民国 38 年全市菜田已发展到 1.4 万公顷 总产已达到 2.4 亿公斤。

第三节 建国后农业生产简介

1949~1957 年我市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由于解放前长期遭受封建制度、日本侵略者奴役压榨和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影响 刚获解放的农村田园荒芜、耕畜、农具缺乏 又加 1949 年遭受大水，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艰难，政府大力组织生产自救 尽快恢复生产。在市委领导下 在农、商、金融等各部门配合下 进行发放农贷、化肥、种子、组织以工代赈 对农业生产大力扶持恢复，胜利渡过灾荒。同时在市郊的国有土地由群众种植的合作农场，采取公私合作经营，废除封建剥削，调整土地使用权，建立公平合理的定额分红制，促进了农场的生产恢复与发展。在生产自救渡荒的奋战中，1952 年全市获得建国后的第一个丰收年。1950~1952 年我市全面进行土改运动，没收地主土地 13581.8 公顷 废除了封建生产关系 解放了生产力 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兴修水利、开垦荒地 增施肥料 精耕细

作的基础上,1952年全市粮田播种面积和粮食总产比1949年面积扩大25.6%增产1.4倍。

土改后根据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的决议》精神,广大农民热情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到1952年全市互助组发展到35381个,有187387户入了组,占总户数的41.45%。同时还组成了151个初级社、2个高级社。1957年全市高级社发展到2789个,入社户数有495807户,占全市农户的99.37%基本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由于发展过快,工作过粗,形式简单划一,而长期遗留一些问题,未获解决。

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公布后,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倍受鼓舞,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首先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大搞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改善生产条件。全市由1953~1957年建成有效灌溉土地14.3万公顷,比1949年增加1.97倍,又打机井43眼。同时发动群众广辟肥源,积肥造肥,利用城市杂肥;合理密植提高复种指数,并抓紧病虫害防治,扩大播种面积5.45万公顷。在蔬菜生产上,开始执行统购包销,计划管理。在生产上推广“春提前,夏排开,秋错后,冬贮藏。”均衡上市,周年供应。同时推广建设保护地生产设备,增加冬春蔬菜品种。到1957年底,温室已发展到1131间,小暖窖1580个,阳畦5450个,增加了蔬菜上市品种与产量。在造林方面,成立营林机构,除组织群众植树造林外,并在北郊由国家营造农田防护林71条,全长2000公里。

1958~1965年农业生产受到挫折并进行了调整。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在指导思想上产生急于求成,不断反右倾,又缺乏建设经验,使实事求是的作风被反掉,而带之以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倾指导思想的发展。1958年我市在

一些省市大放各种农作物“高产卫星”的带动下先后有东郊区新立村水稻公顷高产 93 万公斤；双林农场水稻丰产试验田公顷高产 94.7 万公斤；小站公社水稻公顷高产 117.4 万公斤 静海城关公社甘薯公顷高产 750 万公斤等高产卫星的虚假典型。一些领导看后，不能向群众泼冷水，有的还加以赞场，使浮夸风越刮越大。同时在思想领域开展批判“条件论”“秋后算帐”并宣扬“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的反科学观点 更为浮夸风 虚报高产起了鼓动作用。浮夸产量，使国家征了过头粮，农民口粮水平下降，进一步挫伤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

1958 年人民公社化后，原来的管理体制与劳动组织被打乱 实行军事化的组织领导 搞“大兵团作战”追求生产形式的轰轰烈烈，而实际生产不够落实。秋收未完，调集大批劳力大炼钢铁，使成熟的粮食丢在地里，造成丰产不丰收。在生产上盲目的大搞深翻，打乱了土层，浪费了人力，而且土壤肥力下降影响作物单产。加上 1959~1961 年连续的自然灾害，农作物产量大步倒退 低于 1952 年水平。1961 年全市粮食总产量 472210 吨，比 1952 年减少 86315 吨，减产 15.5%；棉花总产 1620 吨，比 1952 年减产 3005 吨，减产 65%。由于农作物生产严重下降，造成农村粮食十分紧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下 总结经验教训 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从而使全市农业生产出现转机，得到逐步恢复与发展。

在中央发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后 我市继续贯彻“以粮为纲”近郊农业为城市服务的方针 执行了菜农上市蔬菜与粮食、化肥及工业品等生产、生活资料挂钩奖励办法 制定蔬菜生产规划 扩大菜田面积 调整粮菜占地 建立蔬菜技术推广组织，从而使蔬菜公顷单产由 1961 年 18550 公斤，至

1965 年达到 27990 公斤 增长 50%。粮食方面,加强水稻生产,推广新技术,加强植保措施,经过几年努力,到 1965 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 1171650 吨,创历史最高水平,比 1961 年增长 699440 吨 增长 1.48 倍,单产达到 2107.5 公斤,比 1961 年增产 1117.5 公斤 增长 1.13 倍。其中水稻总产达到 450350 吨 比 1961 年增产 322510 吨 增长 2.52 倍。

1966~1978 年我市农业生产出现徘徊、发展缓慢的形势。60 年代初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扭转了“大跃进”造成的农作物产量严重下降的局面,我市农业生产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但是,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我市农业生产再一次受到挫折。

“文化大革命”运动由 1966 年开始,不久全市即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各级领导靠边站被夺权、批斗,生产、工作放任自流。各级农业部门处于瘫痪状态。当时“四人帮”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大批“唯生产力论”。农业部门抓生产即是以生产压革命。陈伯达在天津公然提出,“领导天津农业生产的机构,一人包一个区,有五个人就行了”。后至 1968 年全市农口机构撤销,干部经干校审查、劳动、下放转工人。在文革期间,江青为树个人威信,与“农业学大寨”唱对台戏,三次到宝坻县小靳庄“树典型”,搞成“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典型队”。向国内各省市及一些外宾推崇,要求全国学习,流毒很广。此期间还抓紧村干部、群众的理论路线学习,大搞赛诗、唱歌。掀起在农村批判“唯生产力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堵”资本主义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多项斗争。搅乱思想,放松生产,农民情绪低落,生产下降。1978 年小靳庄全队粮食总产仅 21 万公斤,比 1973 年下降 17.6%,平均公顷单产 3397.5 公斤,比 1973 年下降 17.8%。

全队公共积累和全国、全市的无偿支援抵顶之后，反欠外债 7 万元。但是，全市广大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经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吃尽苦头 刚刚恢复 因而对“文化大革命”这一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漠不关心，并进行一定的抵制，坚持抓好农业生产。又加之在 50~60 年代 我市全力根治海河 兴修不少农田水利工程 平整一部分土地，使农业抗灾能力增强，受涝土地面积逐年减少，这些都给避免大幅度减产，创造了条件，同时有些作物还获得了缓慢发展。

这一时期除去旱涝而使我市粮食减收外，其它年份全市粮食总产量徘徊在 110 万吨左右。其中 1972、1973 年因严重干旱缺水 水稻面积大减 分别比 1965 年减少 72.5%、93.4%。缺水改旱使秋麦面积增加，使全市小麦总产由 1965 年的 10.9 万吨，到 1978 年小麦总产达到 47.9 万吨 增长 3.4 倍。而全市的粮食总产量一直维持在 1965 年的产量水平，未因旱减收。

1979~1990 年为我市农业的发展阶段。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总结正反经验，集中力量把全市农业搞上去，以促进我市农村经济的根本好转。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使我市种植业生产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1981 年开始，我市农村普遍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为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奠定基础。农村经济越来越活跃，开始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变，种植业商品率由 1980 年的 19.4% 到 1990 年提高到 57% 林业商品率由 1985 年的 15.7% 至 1990 年提高到 26.8%。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带动了农业技术推广事业的发展 农民学科学用科学 建成比较健全的机构、网络 由市到县

(区)乡自上而下建立健全了农技推广机构。通过培训、咨询、承包、典型示范和培养科技专业户、示范专业户等活动,把行之有效的农业技术与先进经验及时传给农民,使之转化为生产力。同时为了夺取粮食的更大丰收,因地制宜的对种植结构进行调整,提高经济作物和蔬菜生产的比重,根据自备水源多寡,安排水稻面积,适当压缩小麦面积,对小麦、玉米推行模式化栽培新技术。在良种推广方面,建立健全良种繁育、经营体系,做到良种的不断更新更换,主要农作物品种已更换 5~6 次,玉米、高粱良种已全面杂交化;稻种已实现优种化。至 1990 年全市优种化面积已达 44.93 万公顷,占播种面积的 98%。在农田施肥上,坚持施用农家肥为主,1990 年每公顷施农家肥 25 立方米。同时推广利用城市杂肥,发展绿肥、菌肥,广泛采用秸秆还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对化肥的使用,随着工业的发展,由 70 年代每公顷平均施用 620 公斤,上升到 720 公斤。并由过去单施氮肥,改为氮磷配比混合施用。对化肥施用方法,推行优化配方施用。以氮肥作基肥施用,增施磷肥。在栽培上,玉米推广前促后控的前重后轻的施肥方法,提高了玉米单产。在植保方面,建立起比较健全的测报制度,做到基本预报准确,能及时对病虫害进行防治。防治措施已普遍使用药械,遇大面积虫害发生则可使用飞机喷药除治,提高了防治效果。

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水平的提高。1983 年粮食总产 1108710 吨,公顷单产 2197.5 公斤,1990 年总产 1888000 吨,公顷单产 4245 公斤,分别比 1983 年增长 70%和 93.2%。1988 年受涝,全市有 13 万公顷农田积水,不同程度成灾,全市减产 1.5 亿公斤,但总产仍在 15.8 亿公斤。由 1984~1990 年,平均每年增产粮食 1.1 亿公斤,总产、单产都

较大幅度提高。棉花的产量，1990年为公顷单产855公斤，而1980年仅为195公斤，全市总产量1980年为0.16万吨，而到1990年总产1.53万吨，增长8.6倍。油料作物1990年平均单产1575公斤，总产量4.38万吨，比1980年增长69.3%和67.7%。

蔬菜生产由于投入不断增加，产供销体制的改革，以及科学技术的推广，新品种的更换，地膜覆盖面积的扩大，到1990年总产量达到2681万吨，比1980年总产111.7万吨增加156.4万吨，增长1.4倍。全市人均占有量达305公斤，比1980年增加156公斤。

由于落实林木所有权，加强管理，引进速生优良树种，加强病虫害防治，推行工程造林、飞播造林，使林业生产不断发展。林地面积由1979年的29966公顷，到1990年发展到64066公顷，增长1.1倍。林木覆盖率由5.2%上升到8.99%。

果品生产采用了合理密植和化学药剂疏花疏果等栽培管理方法，同时对低产果园进行改造，促进了果品生产的发展。1980年果园为1万公顷，1990年发展到2.9万公顷，比1980年增长1.9倍，果品总产量也由1980年的3359.3吨，到1990年达到10071吨，增长2倍。

第二章 农业经济综述

第一节 古代天津农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早在距今五千多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天津北部地区即有人类定居繁衍，从事种植、狩猎等原始的农业生产活动。随着海水退却与黄河改道的冲积，天津地区陆地面积逐渐扩大，逐步变成宜于耕作的农垦区。战国初期（公元前 475 年）铁制农具和耕牛犁地技术传入燕地，天津地区种植业、渔业生产活动就有比较频繁的开发。

汉代改革秦朝苛政，实行“重农薄赋”。唐代实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天津虽几经战事，但农业经济仍有发展。宋代、明代在天津实行“屯政”，鼓励徙民进行屯田。明定都北京后，由于官府夺取大量民田赏赐“皇亲国戚”，再加自然灾害频繁，使得农业生产发展缓慢。

清代实行鼓励垦种政策，对垦种多者施以奖励，使垦殖业较为兴盛。

第二节 解放前土地占有及剥削状况

解放前天津地区大部分土地及生产资料除了被地主、富农占有外，城市工商业者、官僚政客、封建行会、教堂庙社等也均占